

吉林教育回忆

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月

封面设计：高国勋 雷子君

封面题字、篆刻：金意庵 刘廸中

责任编辑：鲁仁庄 金铨 孙贵田

吉林教育回忆

(吉林省文史资料第四辑)

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发行
江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233号

内部发行 定价：1.50元

编 者 的 话

酝酿已久的《吉林教育回忆》——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四辑与读者见面了。首先感谢为这一专辑撰稿的作者，感谢大力支持我们的民盟吉林市委、市教育志办和各界朋友们！

吉林的新学堂，同全国各地一样，始于戊戌维新以后。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认识到要图强自存，必须走改革的路。要改革就要有人材，人材的摇篮是学校。因此，必须改变桎梏人民思想的陈腐的封建教育，废科举，兴学堂。康梁变法虽然夭折了，但新学却在各地蓬勃兴起。

戊戌维新以来的吉林教育，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为了借鉴过去，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总结是为了正确借鉴，在批判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继承。今天，党把教育提到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战略高度，能为研究过去的教育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这一辑刊出的文章共十三篇。多数以亲历为基础，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在清末民初以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省最早创办的一些学校。如：清末创办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女子师范，省立第一中学校；民初至“九·一八”事变前创办的私立吉林毓文中学，私立吉林文光中学，吉林省立职业学校，省立女师附小（现在的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前身），我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吉林大学；伪满洲国时期开办的高等师范学校和建国大

学，以及私立会文补习学校，解放战争时的蛟河中学等。内容各有侧重，文字各有特色，对了解吉林省建国前教育情况，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个专辑仅是来稿一部分，余将陆续发表。

因为是回忆文章，有些事实材料虽经查证核实，难免会有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 回忆二十年代在吉林的读书生活 魏际昌(1)
伪满吉林高师的片断回忆 王正绪(32)
吉林省最早的中学 王 悅(46)
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始末纪要 朱 央(58)
我的母校——吉林私立毓文中学 田兆丰(71)
回忆我的叔叔李光汉 李培森(90)
吉林私立毓文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廖维宇 贾成森整理(96)
私立吉林文光中学概况 杨桂林(129)
回忆数学教学大师严石和会文补习学校 马 兰(154)
吉林省第一所职业学校的今昔
 ——吉林电气化专科学校介绍 宋九存 姜志琦(164)
我所知道的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校 杨慧慈(173)
我记忆中的蛟河中学 杨菊月(186)
我所了解的伪满建国大学 刘第谦(202)

回忆二十年代在吉林的读书生活

魏 际 昌

一、二十年代的吉林学风

不用说，这个题目顾名思义是要报导一下二十年代吉林省的文教风气的。我所以选用它作题目，却是怀着一种景仰的心情去纪念我的一位初中时的同学于仁洲同志的。他是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廿五班的一个青年学生。他生得圆脸俊目，风度潇洒，而且伶牙利齿，善于讲说。那是在一九二四年秋季的某日，学校在理化教室举办演讲比赛会，参加的学生都是预选过了各班少数讲演员，如初中教员讲习班的刘守光（毕业后被聘为吉林省立女子中学的训育主任，扶余县人，抗日战争初期死于汉口），廿三班的我和于仁洲等人。评议员除本校的语文老师傅仲霖，社会学老师胡体乾，还有吉林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刘迪康，一师校长王甲第等也在座。

刘守光的题目是：《最后五分钟》，说来铿锵有力，要言不繁：说不管干什么工作，都须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关紧要的就是这坚持到底最后五分钟的精神，“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嘛，否则没有不失败的”。他人既老练，题目定得又警辟（发言只限五分钟），会还没有开完，大家便知道这个第一，定规是他的了。

于仁洲是第二个讲的，题目是《吉林的学风》，他说：“吉林地处边陲，文化落后，学子莘莘，却学不到什么真本领，照旧是些封建脑袋瓜”，这些话还不打紧，接着一扣题，举具体的实例，可就要了命啦。说：“看看掌管教育的这些人物吧：教育厅

长头脑冬烘是个封建余孽，有的校长是个抽大烟的，有的校长则是讨小老婆的，……”，没等他说完，王甲第便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滚下去！会不要开了，怎什叫学生当面骂街哪？连我请来的客人都捎带上啦，狂妄已极，成何体统！立刻挂牌开除”罪名是“侮漫师长，目无法纪”。此事当时给我的震动很大：佩服于仁洲的勇敢，痛恶王甲第的专横。

这不就说明了问题吗？老生常谈毫无新意的刘守光可以得第一，被重用；革命性强，敢于揭发批判的于仁洲，要算大逆不道，立刻被赶出校门，试问这是给哪个阶级办的教育，开的学校？岂不昭然若揭！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开明进步的新思想与封建落后的旧制度尖锐斗争的情况了。

别看吉林僻在边外，受制于内外敌人（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垄断和剥削），比起辽宁（当时叫奉天）黑龙江两省的文教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从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的前夕而言，欧、美、日本的资本主义教育思潮即开始流传进来，五四运动以后的爱国思想，和北京、上海的新文艺作品也不断地渗入，尽管那时我们还只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却都受了感染，“即知即行”，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特别是关于抗日的）层出不穷，《新青年》、《语丝》一类的进步刊物最受欢迎，因为这里早已有了地下党在活动了。例如，我们不但听过周总理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老战友、吉林老一辈的布尔塞维克马骏同志的讲演，还经常跟跨党的红色美术家，吉林第五中学的图画教员朱一士打交道。

马骏，吉林宁安人，他那时的公开职务是私立毓文中学的国文教员。约卅岁的年纪，中等身材，二目炯炯有神，领下却留得一把胡须。他穿着朴素。灰布大褂，青布鞋，头戴一顶旧呢帽，神色庄严，语言洪亮。因为是久仰大名的人，所以一进理化教室便掌声一片。记得讲演的题目是《救救中国》。其时已经是天朗气清黄叶飘飘的秋季了，他不慌不忙，出言有章，取譬贴切，

动人听闻。总共只有一小时，就把许多青年人迷恋住了！真不愧是位革命宣传家，连眉飞自动，举手投足都赋有醍醐灌顶、耳提面命之意，而且从开口到结束一气呵成，不假雕饰，真是天衣无缝的口头散文。当时的感觉是：了不起！从来也没听过这样好的讲演。他说：

“旧中国已经是一座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破屋了，但只修修补补、顶顶支支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必须把它彻底推倒重新建造成，美轮美奂的大房子，才是正道。这要靠谁呢？自然是首先种田织布、搬砖弄瓦的工农劳苦大众，可是宣传鼓动的责任却非我们担负起来不可。因为他们目不识丁，失学失业，暂时还不晓得这是军阀、官僚、地主老财和帝国主义层层剥削压迫的结果，非常需要我们提醒帮助。所以，亲爱的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不能坐在课室里啃书本当书呆子了，必须急起直追地做些实际工作啦。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官僚。”（大意如此）。

因为这一席话感人太深，我便把它写在作文簿上给国文教员看（绰号小周，奉天高等师范出身，在吉林考了个第二等文官，就要出去当政务厅的科员啦），你猜他怎么讲的？他先在我的文章后面批道：“这是共产党煽动人起来捣乱的话，怎么也记下来给老师看，下次不可！”还在班上公开的指摘说：“现在的青年真没办法，谁的话都喜欢听，什么革命，救国！这是不安分的表现，危险得很，小心上当！”虽然他未提名，我可知道是在奚落我哪。

朱一士是国民党地下组织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其他人为刘不同、王诚、张惠民、刘耕一、朱晶华、兰文蔚等，朱、兰都是共产党员，兰在敦化还掌握一部分农民武装）。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吉林牛马行附近的一个民宅里，简称“三号”。他瘦瘦的身形，常穿西服，态度和蔼，很是健谈，（斗争性相当强，曾在上海、吉林两次被捕入狱），他在吉林的表现，据我所

知，大概有下列三者：

幕后鼓动支持吉林学生爱国运动，跟学生会的代表不断联系。如在大革命前后的通电拥护北伐，反对军阀割据、打倒卖国贼、抵制日货、游行示威、向地方政府请愿等等，他都经常参预。

他在吉林省城新开门里魁星楼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对过开设了一个“春雨书店”，自任经理，专门介绍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反杜林论》、《列宁哲学笔记》和当时关内许多进步的新文艺、鲁迅郭沫若的作品等。工人、学生基本上是可以在店内取阅的，不一定要购买，所以，两间门市部里是经常挤满了读书者的。（马列著作则须有熟人介绍，从后屋里授受）。

国民党跟地方军阀官僚等封建腐朽的丑恶势力公开合流以后，他拒绝参加这个以张作相为主主任委员的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旧执行委员张惠民、刘精一等都走马上任了，地点就是新开门外吉林省议会的旧址）。没有多久，听说又被捕了，并且械往南京，终于牺牲。

与此同时，还可以大书特书的是：吉林毓文中学（私立的，只有初中，地点在水门洞子里，松花江北岸边上）才是吉林中学校一个革命的摇篮地。先前的老共产党员马骏，后来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都在这儿工作与学习过。这个学校的语文课程其内容也是比较新的（不作文言文，选讲当时的新文艺作品），与只重古文保存国粹的第一师范刚刚相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它的校长李光汉首先被日寇迫害致死，亦可佐证。

总之，自从我懂事以后，就知道吉林虽僻处边陲，也不是没有新生的革命势头的。夹峙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青年学生起码是害怕当亡国奴的，所以他们警惕的心理，向上的精神都相当高，而就其斗争的情况来讲，的确不后于奉天黑龙江。只以封建势力太大，投降卖国者多，遂使有志之士“徒呼负负，”终

于不免九一八事变的灾难，抚今慨昔，难乎回首了！再举二事为例：

自从张氏父子（作霖、学良）统治了东北以后，一切军政财经大权都由奉系操纵包办，吉、黑两省是没有份儿的。独有文教一项，也可能他们“发了善心”，交给本地人干，所以教育厅长一席，向来是吉林人的禁脔。主其事者较早的有于源浦（榆树县太平川于家，从清代中叶以来就是世代簪缨，几辈翰林。三省的士绅多是他们的门生故吏，例如黑龙江省长宋小濂，即是河南抚台于荫霖的学生。）那个主办国文会考的，抽足了鸦片之后，只晓得吹嘘自己“家学渊源，过目成诵”，临死公亏了永大洋二十万，还用穿龙杠抬回了榆树。继任的王可耕是于家的外甥，他的好处是任用了几个关内念过大学和留学东洋的知识分子如赵雨琴、张寿昌、谢雨天、傅贵云等充当了秘书，科长督学、校长，一时使吉林的文教界颇有推陈出新、欣欣向荣之势。但充其量说，不过是开明一点儿的地主资产阶级教育措施而已。

这其间还有两位厅长，一个是勾结日本人出卖铁路铺设权的刘芳浦，一个是携款潜逃到北京做了富家翁的王伯康。

那个刘芳浦是由省议会副议长转任的。平日坐着由白俄马夫赶着的大马车，招摇过市，可是当他的卖国丑行被学生揭发批判时，他却纡尊降贵恬不知耻地跑到第一师范的理化教室拉扯一些同伙（都是吉林的劣绅）来借以遮羞，一付狼狈相实在不堪（突如其来，前此根本没有到学校视察过）。记得我们用《苏武歌》的调子给他编了一首《骂刘芳浦》，起首即是：“卖国奸贼刘芳浦，卖地买议员，当了七八年，保土匪，抽大烟，真是个黑心肝。早有卖国意，钻营得了官，污辱文教，误人子弟，臭不可闻焉。而日本小鬼勾结此贼，骗去了铺路权！”学生上街宣传的时候，到处高唱，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叫他滚了蛋。

那个王伯康也坏得出品，先借着吉林法团头头教育会长的虚衔，夤缘谋干到手厅长，大把地搂钱，大办其母亲的丧事。

“九·一八”事变一起更中下怀，带了公款逃之夭夭，在北京西城买了一片住宅去做寓公了。有人问起，他还嘻皮笑脸地解说：“应该算我高明，不然的话，也是白便宜了日本人！”这不是屁话吗？你为什么不把钱款交公，即是拿出来救济逃难的同乡也好嘛。显见的是“巧言如簧，颜之厚矣！”不料这个贪污分子竟活到了日本投降以后，又犯了官瘾，巴结上国民党接收大员，降格以求地回吉林去当县长，结果是被解放军镇压了完事。

等而下之，再看看省城县市一级的教育官是些什么角色，也举两人：杨梓玉和韩石卿（凑巧都是下九台人，旧属吉林省）。

老劝学所所长杨梓玉五短身材，厚嘴唇子，道貌岸然，总以教育界前辈自居，其实却是一个一味钻营的旧官僚：在市政公所所长任内连马路都未补好，可是大东门里通天后街，自己的大宅院建起来了，转任省田赋局局长以后，又利用职权近水楼台地买了二百多垧旱涝保收的好地。这个人想当教育厅厅长只是没有弄到手。他在省政府会议上，一再提出整顿学风的议案说：“现在的学生，放着书不念，净谈抗日爱国，这不是替咱们惹事吗？又有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的，毫无礼法，真是红毛野人；教员们呢，也不好生教学，离经叛道，攻击起祖先崇拜来，如果儿子连自己的老子都不认了，那还成什么世界！”试想想吧，这是不是八十世纪的老脑袋。

韩石卿，“裘马自轻肥”的吉林教育局局长，他是杨梓玉的继任者，由于兼着省教育会会长，他这个局长便成了“铁帽子官，”一干就是二十年，谁也动不了（会长五年一改任，连选得连任，由于他财大气粗、谁也竞争不过：收买、哄抬，双管齐下，因而也成了“世袭职”）。要问怎么个“财大”法，我们只举一端，吉林县的小学教员月薪永大洋卅元，可是实发廿七元，那三元说是因经费困难，须谋生产之道，留着购买学田地啦。钱是按月扣了近二十年，可是学田在哪儿？到底多少垧，谁也不知道。这是明摆着的事，如以吉林全县只有五百小学教师计算，一个月就是

一千五百大洋，一年呢，一万八千块，那么十年廿年呢，岂非已有卅五、六万了。对于这个人来说，自然是无穷的富贵，还说教师机关是“清水衙门”哪！

省、县的文教大权虽然常由这些封建老顽固们掌握，可是“青出于蓝”，学生自有学生办法。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成立学生联合会，奔走呼号，游行示威，创办进步报刊，宣传革命思想，不怕封禁，变着法儿印发。注重德、智、体三育，交流经验、互相观摩，以文会友，比赛球类，爬山越野，生气勃勃，而逃婚在外半工半读，不受地主家庭羁绊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日益多。杨梓玉辈何能挡住潮流，这从学生们经常贴出的标语、喊来的口号即可略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还我河山！还我旅顺大连！还我青岛！

反对吉敦铁路延长，收回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地！

打倒卖国贼！睡狮猛醒！

鬼子矮，走道歪，他的货物我不买！

开卷有益，读书便佳。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业精于勤荒于嬉。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俭是美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不自由毋宁死！自由、平等、博爱。

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不做东亚病夫。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常动故也。

二、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它是吉林全省资格最老的一所学校，远在清季末年光绪维新以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便以吉林优级师范学堂（直到一九二〇年我们入学时，这个老字号还嵌在凹字形课室楼正门顶上的门额上边呢，刻砖泥金颇为醒目）的名义，开办在省城东郭旧名东

局子的土围墙以内了。

这个土围子在松花江北岸（与庚子年被毁于沙俄松花江的南岸老机械局残址遥遥相对），占地五、六百亩，是个古堡（墙高三丈，厚可一丈，上有女墙，还修得有炮垛）。一师在土城的西首，出入南门（门额似为篆文“紫气东来”四字，其左侧为满文），中为老银元局（后改军械厂），东头是甲种农业学校（后改为省立第五中学）。

学校大门面对土城南门，系旧式起脊的前廊后厦，带有小狮子上马石的砖门楼，左右各有门房一大间。左手有号房，右手为储藏室，后充学生小卖部（文墨纸张本子等零用物品，早晚也卖烧饼果子，全系学生自己办的），入门正厅五大间，中为接待室东系校长室，西系为教务主任室，方砖甬路，出廊出厦。

校门两面的厢房则是文牍室、庶务室等办公地点了。天井中花木扶疏，有老柳树、丁香花坛、榆树梅、天竹花，幽静宜人。正厅后的广场西侧为学生宿舍和饭厅，饭厅后是学生大厨房，东侧旧为空场，后辟为排兰球场，（网球场在土城南门外校园内，足球及田径在南门里课堂楼前，校园莳花刈草，有凉亭一个）。

课堂楼硬砖到顶带有油漆走廊，上层为教室，下层自修室按年级高下轮流派用，待升到正面楼五年级时，便将毕业离校了（老班头的学生最有势力）。楼院内也有花木草，环境美丽。课堂楼对过顺排起来是学监室、教员休息室，走廊通道、阅报室、勤务人员室、教员住室，再后一排，左为大教室，右为理化教室；最后一排左右亦为教室，迎面为礼堂，业已背靠后土城了。

课堂楼西侧与东侧一样，也是长排的学生宿舍（一号四间，对面土炕，一炕四人，两面八人，宿舍中间一个小缓阁，迎门为小堂屋单炕四人），宿舍西南是教员宿舍（单人的），东北为新建的学生宿舍八间，宿舍前是网球场、音乐教室（系旧庙，泥像已无，闻为火神），大厕所在北边城根后城门前。

因为它是一个官费学校（不交食宿费），伙食又比较好（最

初曾四、六、八碟地吃细粮——白米蒸馍，每日两餐，后来也是豆包馒头、炒咸菜、大米粥、应时蔬菜。豆干饭，五月节、八月节还要杀猪宰羊，另办伙食），有“吃饭学堂”及“老豆包”之称，而学生却是各县保送的地主子弟居多，余额凭考取。这个学校的教员几乎全部是毕业于关内大专院校的老一辈的学生（北大、师大出身的多，也有少数是留学东、西洋的）。

我在这个学校前后共读了六年半书，经过的校长凡五个：吴献芝（后来转任县知事），王希禹（宾县人，北高师出身，是学教育的，由教务主任荐升），杨维周（长春私立中学的一个校长，不到半年便被学生赶掉），王甲第（也是宾县人，对学生采取了高压手段，动不动就讲开除学籍），傅贵云（扶余县人，先为国文教员，后升省督学，转任校长，他是个开明人士，业务也不错，所以颇受学生欢迎）。

这个学校很有几个特点：入学及学期考试都列榜（他们叫“贴榜”），讲究争取第一名（前五名算最优等），名次下面写着学期总分（各科总平均，采取百分制），报名工读生的学生必须名列前茅，总分在八十以上的才有份儿（工读生免除杂费，每学期永大洋八元）。教室及自修室也按榜次排列，“考第一的”学校另眼看待，颇为光荣。

体育活动很有名：足球、网球、排球联赛常得锦标。特别是开全省运动会时，田径总分没有一次不是冠军（全省也只有师范、中学，各五个，球赛只是省城的几个学校：一中、五中、毓文和一师参加，独独兰球不行，这是一中的拿手）。这是因为学校重视，场地方便，学生也蔚成风气，起早贪晚地练，球类则班级之间经常比赛，体育老师前有高史占，后有傅秉鉴，都是关内体校（上海体专和北高师体育系）出身的。一中的体育主任李香谷（后为吉林大学体育主任，并负责市内通俗教育馆体育部，主办球类比赛），资格最老。

它的作文成绩也最好，民国十三年吉林教育厅于厅长（源

浦）搞了一次国文会考（题为《汉武帝论》和“七绝一首”半日交卷）一、二名和前十名，一师占了五、六个。于厅长亲作批语，传见领奖，廿一班的王克仁得了“状元”，成为于厅长的门生，二十班的马某（忘其名）也不差，算是榜眼，我们班（廿三班）的侯封祥大概是七、八名（他没念小学，私塾出身，吉林双阳县人），我自己虽也未落孙山，却在十名以外了。

带便应该谈谈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那就是老学究居多，以教过我的老师而论，祁之采只晓得选读清代古文如《书鲁亮侪》之类，我们也早起晚上的读读《古文观止》、《东莱博议》，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直到读后期师范以后，才碰到两位比较博学的老师：高亨（晋生，原名仙翹，一师十四班毕业生，后入清华国学专修馆，是梁任公启超的高足，小学底子深，我国有数的笺注学家，《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是其名著，历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及教授。另一位便是前面提过的傅贵云（仲霖，其后改名傅鲁，他绰号小傅，是吉林文教界的一员“福将”——督学、校长、大学讲师、教育厅科长地扶摇直上。他的业务比较新，《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等科目都是他开蒙的，为人静默寡言温柔敦厚颇得学生欢心）。他们两位对我的影响都不小，后来还在大学同过事（东北中正大学中文系、辽宁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

另外的国文教员记得还有季绳吾、傅伯雨以及周某等，或因没有直接听过课，或因相处的时间短，印象便不很深了。（有一位数学老师绰号吴几何的倒还不曾忘记，虽然我的数学成绩很糟，仅能及格，代数尚能凑合。因为这位老先生公式熟、板书好、爱教高材生，又是一师的前辈教师之故）。

三、旧吉林大学

说来也够神气，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末期僻处东北边陲向称“山高皇帝远”的吉林省，居然也设立了自己的大学（吉林士

绅这样得意地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因为那时东北军阀张氏父子（作霖、学良）统治的晚期，（张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其子张学良继承了父业，成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奉天早已有了名贯三省的“东北大学”。人家有人（校长由张学良兼，教授都是挖的北京大学的墙角，如国学专家黄侃（季刚）、古代散文家林损（公铎）等，全是高价特聘的名教授。这还说的只是中文系的），有钱（在沈阳北陵新建的大楼，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占地五千余亩，实习工场农场、现代化的体育馆俱全），又有学生（不限东北籍的，关内的学生也招收，待遇优厚以广招徕。高等教育嘛，还能分地区。其实是张学良为自己统治东北培养人材），贫乏的船厂哪里比得上，真是“小巫见大巫”啦。

但是，“哀兵必胜”、“有志者事竟成”，吉林人不甘落后，管它“三七廿一”的，到底把大学办起来啦。具体到这一点上说，应该算是吉林帮对奉天帮斗争的胜利，然而也煞费苦心了，首先是钻了“文教的事由吉林人自己办”的空子；其次是抬出来吉林督办兼省长张作相，让他当大学校长，“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第三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把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戴上帽子，扩大一下，（行政上也是旧班子，再加上一中、一师和教育厅的某些老人）便撑起了门面，挂上了招牌。学生呢？更好办了，应届毕业的吉林省中学、师范的高中和后期师范的学生，还有高等小学的教师（同等学历也行）。“百年之计在于树人”既然这个大学的开办是为了培养当地的人材的，岂不应该广事搜罗、多多益善。对于那些没有经济力量，没有政治后门进关升学、出洋留学的青年来说，这自然是近水楼台，终南捷径，求之不得的事。

这个大学成立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八月，它的临时校址在吉林省城西城财神庙胡同（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旧址），只有一个小院子，二楼的四合楼一座（这是校本部和文法学院的